

特稿 43

10年前,一部以真实记录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调查》,让作者陈桂棣、春桃夫妇获得众多关注。

10年后,这对夫妇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这一次,他们决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,接受来自大众的解剖,只因为那个最普通不过的身份——学生家长。

用春桃自己的话说,在中国,但凡有孩子的人,对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怪现象,都存有一定“看法”。

成长的出路,在哪儿

■本报记者 李瑾 文/图

2005年到2010年,是陈桂棣、春桃夫妇最难捱的时光。

一场没有终结的官司缠身,让两个人纠缠在说不清对手在哪儿的司法“对抗”中,不堪骚扰。最终,他们选择从合肥退守到春桃的故乡——萍乡,打算恢复安生的日子。正巧,儿子小明也到了上学的年纪,一切都需要这个三口之家尽快恢复平静。

意想不到的,最艰难的时光才刚刚开始。

伴随着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,有关教育的另一场“对抗”无法回避。近十年间,曾经阳光开朗的小明,在几次转学中变得冷漠、压抑,又在沉重的作业负担和缺乏爱的教育中成为一名厌学的孩子。

看上去,这个有关教育的话题有点陈旧了。但是,当一个母亲把这一切完整而细腻地记录下来以后,人们惊讶地发现,成长竟然如此沉重。

成为一名小学生

从安徽合肥到江西萍乡,800公里。
2005年夏天,春桃带着小明搭火车转汽车,很累,却很愉快。

在春桃的日记里,小明一路兴奋,新奇地在双层车厢里跑上跑下,拍着小说说:“妈妈,旅行真好玩!”

小明并不知道,这其实不是一次旅行,而是不得不开始的一段新生活。

这一年,由于《中国农民调查》纪实报告文学,春桃夫妇得罪了一些地方官员,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,甚至还有污秽之物扔向自家的阳台。

萍乡是春桃的家乡,小明的户口也落在这里。春桃决意回归家乡,不仅可以换个环境,更可以到了上学年龄的小明进入课堂。

2005年8月25日,春桃牵着小明的手,站到东门小学(化名)的大门前。

一切都在既定轨道上开始运行。和太多的家庭一样,围着一个学生转的生活,更像是一张战役。没几天,小明和同学之间的打闹,首先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。

“小明抓我头发。”同学小龙首先向老师告状。

小明在一边怯生生地说:“他先打我。”

老师问询边上的学生,到底谁先动手?大家七嘴八舌,没人说得清“真相”,老师只好各打五十大板,两人都挨了骂。类似这样孩子之间判不清的官司,一旦加入了试图分出黑白而又永远分不清黑白的大人的意见,便开始变得难缠起来。

孩子之间的打闹,家长还是应该看得淡然一些。然而,被冤枉的委屈仍然像一枚种子,在小明的内心深处扎根。春桃决定,为小明换一所学校。

这是小明第一次转学。春桃说,她只是想让儿子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,因为作业负担沉重的东门小学不适合小明,北门小学(化名)至少离家更近一些。

北门小学建在跃进路一侧的山坡上,几幢教学楼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。因为地势的原因,孩子们活动的场所便非常有限。沉重的作业负担,让原本性格阳光的小明,也变得逐渐沉闷起来。

有一天,春桃无意中看到,儿子佝偻着背做作业的样子,真是心疼。孩子身体发育上的隐患,春桃归咎于北门小学简陋的体育设施和硬件条件。加上对重点学校的向往,这一次,她托了关系,把儿子转入了重点学校南门小学(化名)。谁知道,这一步,在日后的春桃看来,简直就是将儿子推向了“深渊”。

永远写不完的作业,几乎是每所学校的标配。重点学校高压式的管理方式,更令孩子和家长沉浸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。

春桃真正崩溃的是,看上去和蔼可亲的班主任周小萍(化名),居然不动不动就骂学生。



小明喜欢画画,陈桂棣觉得,这或许是儿子未来的出路。



能够赢得国际文学大奖的作家夫妇,不一定能够养出一个“好孩子”。

一次,小明哭着说要回北门小学,因为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把他的作业扔在地上,并讥讽那是“天下第一格式”。原来,刚刚转学的小明不知道周小萍老师的统一要求,照样沿用了在北门小学写作业的习惯。面对老师的呵斥,他吓得不敢哭出声。

这是小明第一次被老师粗暴对待,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”,陈桂棣、春桃夫妇多年后回忆儿子的变化,总是忘不了这次拐点性事件。

作为母亲,春桃当然不满老师这样的做法。但是,她和所有的家长一样,决定忍气吞声,甚至试图通过送礼物来讨好老师。

从好孩子到差学生

小明上学的日子,似乎从来都未曾平静过。周老师的作为,也越发让春桃郁闷。

那年冬天,萍乡下起豆大的冰粒子,让人感到一种浸透肌肤的阴冷。然而,儿子的心理状态,让春桃感到更加寒冷。

这一天,春桃接小明放学后关心地问:“今天周老师对你怎样?”

小明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:“今天丁大鹏跑去向周老师告状,说我骂了他。我马上解释,说没有骂。周老师却不要我解释,就对丁大鹏说,‘你不要理他就是,不要把他当人,就当他是畜生!’”

听到这句话,春桃心中猛然一紧,一股气忽然压上心头透不出来。小明并不知道妈妈的心情,说到同学都笑他“不是人”成了“畜生”时,放声大哭起来。

悲愤——春桃在书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。这也是她第一次听到儿子明确说,“我不敢去学校了”。

这样的心情,一次接着一一次。小明说,周老师把班上同学分成了“好生”和“差生”,“好生”坐在教室中间,“差生”都靠两边坐。小明,当然被划为“差生”。更让一个母亲无法接受的是,小明无意中撞倒了同学,被周小萍老师连打了好几巴掌。当然,周老师不仅打过小明,还打过班上不少同学。

这时,小明已经在南门小学读了两年书,心态阴郁,母子俩很久没有敞开心扉聊天了。

“那是一次意外。”春桃回忆,“那天晚上,我陪儿子去同学家玩电脑,因为要走一段特别黑的荒野野路。儿子路上说的话,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忘记。”

春桃在书中记录了当时的对话——我生气地问小明:“你实话告诉妈妈,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王小天家玩电脑?”

他突然提高了嗓门,歇斯底里般地喊了起来:“我讨厌周老师,讨厌上她的语文课!我不想上学了!”

他猛地提高的喊叫声,被长长的隧道瞬间放大,并在空旷的四野响起了一片回声。我惊得一个愣怔。

我得承认,我被小明歇斯底里的喊叫吓住了。我不知道他会变得如此暴怒,突如其来的暴怒,像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,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,瞬间喷发。他的声音很大,语速很快,就好像有谁不准他说活,像子弹一样射出来,一副要与人拼命的样子。

“我们尝试反抗,结果失败了。”春桃说,“你无法想象一个地级小城市关系网的复杂。”

春桃先是尝试联合别的家长,一起向学校提出换老师的要求。但是,有人担心惹出事来,孩子在学校更难过,最终不

了了之。她想自己解决问题,却被警告说“周小萍有个亲戚在市里当局长,关系很硬”。

“无论怎么做,都像拿石头砸棉花。平时再大的问题,我都能够找到方法去处理,只有这个事情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春桃觉得自己真是成了堂·吉珂德。

对过往那段时光,春桃始终无法释怀。她看到这所重点小学经历过一场“教师罢课”事件后,校长被撤职,继续忍耐着周老师的高压教育方式,感受过校外辅导产业的商业变形,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个母亲,她目睹着一个单纯的孩子,从对写作的热爱到对学习的厌弃,逐渐染上网瘾,甚至因为玩闹招惹警察上门……

是不是大城市的教育能好些?春桃夫妇开始为小明另谋出路。他们听朋友的劝告,花了几十万元在天津买房,想藉此给儿子办一个“蓝印户口”,转到天津上中学。

然而,显然有太多的外地人有着相同的想法,天津的中学根本无法一下子接纳那么多的学生。更重要的是,小明明确反对。

这一次,春桃终于明白要听听儿子的意见。“他不愿意干的事,就不强求了。以往几次转学,我自己的责任也不小,几乎没有听过孩子的意思。”

书写6年求学痛

伴随着小明的求学经历,春桃每天的日记里,情绪跟随着儿子的故事跌宕。直到有一天,这对曾经真实记录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作家夫妇意识到,既然自己有这么痛苦而深刻的感受,何不做一个“中国教育调查报告”?

彼时,陈桂棣和春桃正在为新书《寻找大别山》和留守儿童题材的写作搜集资料。他们每逢前往合肥、大别山应该更具素质的教师队伍伍素质堪忧。“教书对很多人来说,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。占有更多资源的重点学校,反而成了后门的重灾区。”

调查做得并不困难。尽管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有一肚子苦水,都在指责畸形的教育体制,但到了真要把抱怨变成白纸黑字的时候,问题就来了。

一些老师讲完很多学校的真实“故事”,却坚决不同意陈桂棣和春桃“把它写进书里”。当然,抱怨起来怒气冲天的家长们也是这样。春桃和丈夫也犯了难。“这还怎么完成一次报告文学式的教育调查?如果书里有一点细节不实,又会引来一场官司,我们折腾不起了。”

就在这时候,陈桂棣才知道,春桃一直在记日记。“我知道她每天都写东西,但不知道她写日记。”这个偶然的发现,让夫妻俩豁然开朗,“我们为何不写自己呢”?

这是无奈的选择,也是最恰当的选择。春桃开始考虑,把自己的日记整理出版,来一次现身说法。

2014年即将到来的时候,这对作家夫妇的新著《南上北下求学记》出版。其中,记录着母子6年来的挣扎和痛苦,陈桂棣则以议论教育话题的评论者角色出现。他们将众多采访的内容,由一位虚构的郑坚老师之口说出,以期在个人视角的琐碎中,加入更多的宏观现实。

将自己这些“不光彩的”隐私故事写出来付梓出版,遭到了身边朋友的反对,因为“有损一个成功作家的形象”。但春桃夫妇认为,“现身说法是要让大家有所启发,必须对家长、对学校有所冲击。”

冲击在新书面世后没几天就来了。一位萍乡的爆料老师告诉春桃,书中暗指的南门小学校长震怒,竟然在学校追查“是谁讲出去的”。甚至,这位老师为了自身的安全,谨慎地用公用电话给春桃打电话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,能起到什么作用。唯一能肯定的是,如果我们儿子还在萍乡念书,我肯定不会出这本书的。”春桃并不否认,他们和天下所有的家长一样,孩子是他们的心坎。

要如何“抗争”

对教育体制的批评,人们已经听到的太多。这一次,当陈桂棣、春桃夫妇携带着新书坐在读者中间,分享这惨痛经历时,出乎他们意外的是,很多人的反应并不那么“友好”。

2013年12月28日,北京单向街读书会。交流环节开始,一位学生家长直言不讳地说:“不要总是抱怨体制,如果没有对策,孩子的时间等不起体制的改变”。

另一位小学生的母亲,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“反抗”方式。

“我的孩子也像你的孩子一样,在学校遇到了很多问题。但是,我并不认为应该转学,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差不多。我要他自己面对,同时告诉老师,不要管我儿子,只要他不影响别人,他不听课就不听好了。”

这位母亲站在会场最后,言语中透露的自信给人印象深刻,“我同时也告诉儿子,你的一切事情都要自己负责,你学习不好,是你自己的事,我不可能为你的错误兜底。一开始他也玩,但后来发现,真的没人管他,他就开始害怕了,慢慢地,孩子学会自我管理,有自己的独立思考,他的内心也变得强大起来。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用和对的事,学习也开始步入正轨。当然,这个过程中,我并不是什么都不做。我自学儿童心理学,用科学的方法在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人格。我建立了一个QQ群,很多妈妈在里面交流,大家试图通过更好的方法,来与并不令人满意的学校教育说‘不’。”

而有些人说“不”的方式更为彻底。一位孩子的父亲站出来告诉大家:“既然不满意现在的教育,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去接受你认为不合理的东西?我自己开了个私塾,我的孩子就在私塾里上学。”这样彻底的“对抗”,让春桃和丈夫一时语塞。

几天以后,春桃夫妇在家中向记者重新提到这场读书会时,显然已经回到到自己的思维轨道上。这一次他们明确表示,“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,能不能彻底向现行教育说‘不’,也和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系。至少我们这个家庭,不可能脱离现有教育体制。”

采访进行中,一位在读书会上有过私下谈话的“康爸爸”发来短信,希望和春桃就孩子的问题交流一下。

电话那边,“康爸爸”试图用自己的故事,来开导春桃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更大胆一点。“我是全职父亲,我的孩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遇到各种问题,进进出出学校两次,最后决定自己带了。”

“康爸爸”把家从河北搬到了北京,利用北大、清华的开放,让孩子提早接受顶尖大学的熏陶,重点放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上,“他喜欢戏剧,参加了一个戏剧社,后来因为能力过硬,被那个戏剧社聘用,现在从事的工作都是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项目,这难道不是成功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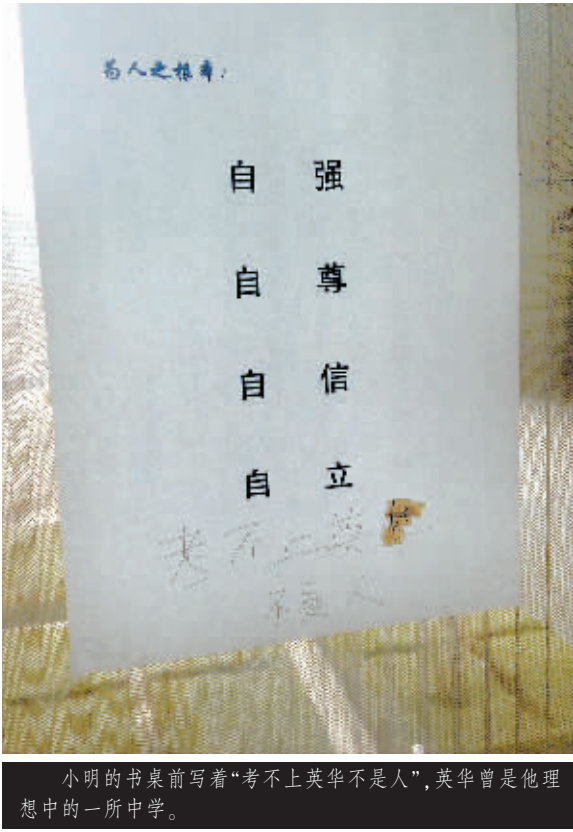
放下电话后,春桃依然难以理解这样的教育选择。在她看来,这样的成功也只是“个案”,应该并不具有复制的意义。“大家都在找出路,但我怀疑,这样极端的做法,真的对吗?我不知道,我自己也还在摸索。”

更多的回应者,是很多正经历着小明曾经经历的一切的家长,在《南上北下求学记》中,他们看到了自己,找到春桃诉说着自己的无助。

“一开始其他家长都说是名师,我就严格跟随,后来发现作业留一堆,其实她也不检查不判。我努力当个好老师,要不就想换个学校。”

“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所以周末全部陪着孩子,尽量弥补过失。我觉得,他(儿子)的心是不是近3年来都没有被爱滋润过,有些铁石心肠。”

……



小明的书桌前写着“考不上英华不是人”,英华曾是他理想中的一所学校。

这样的求助,在春桃的QQ、微信、短信中,比比皆是。“他们就是想找个人聊聊,面对孩子的问题,他们不知道怎么办,那种无助和痛苦,我太清楚了。但是,我也只能以我有限的体会开导他们。真正要让孩子重新快乐起来,并不容易,这更像是对父母的一道考题。”

成功闯关了吗?

责怪教育体制有用吗?能改变吗?

“要是都觉得没用,谁都不说,不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吗?”陈桂棣的叙述风格一贯高端,更善于从宏观视角来解答来自不同人的提问,“我注意到,三中全会的决定中,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部分提得最多,也最详细,我觉得至少这是个希望。”

春桃的回答则更显得无奈:“我只是希望教育界能够受到冲击,能改变多少是多少。”

“现在我们的教育,三句话就概括了;以灌输为手段,以应试为中心,以剥夺学生的创造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的这样一种体制。”陈桂棣总结他对中国教育的观察认识。

对于小明厌学的原因,春桃觉得首先是老师的素质太低,缺乏爱心,用惩罚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。同时,她也一再提到《人民日报》登过的那句话,“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”。

那么,小明去哪儿了?就在采访即将结束时,小明放学回家。这个瘦瘦的少年长相清秀,乖巧地问候。

春桃说,书籍小明看过一部分,“是哭着看的”。

两年前,春桃为小明在北京亦庄的家附近,终于找到了一所适合他的学校。“这里绝对不会出现打孩子的现象”,每个班只有20多个人,各种活动很多,适合孩子发展兴趣爱好。

每天,小明做完作业,春桃都会陪着儿子到楼下散步。母子俩人的对话,与那年那个漆黑的荒野里,歇斯底里的呐喊与撕心裂肺的震惊早已相去甚远。

这样的时光,春桃很为享受。

能够与昨天的生活再见,对春桃夫妇来说,更像是一次关于勇气的闯关。

这些年,夫妇俩被邀请出国访问时,也都会考察了解当地的教育。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德国,“德国的孩子没上小学之前,是不允许教孩子认字计算的,小孩就是玩,通过游戏来培养勇敢精神和沟通交际能力。”

国外的教育理念让夫妻俩羡慕,但眼下的问题还要靠自己解决。

春桃阅读了大量的教育书籍,并进行了大量反思,最关键的一条是:“必须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”。

陈桂棣称,通过这次的书写,总结了两大教训。第一是望子成龙,期望值太高;第二,替孩子安排未来,给他转了三次学,没有征求他的意见。

春桃则找到了更本质的初心:“我们当初要孩子是因为爱孩子,只要他快乐,做什么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,当保安就还是当售货员,我都可以接受。”

对这夫妻俩来说,握紧的拳头终于松开了。在赢得了一片自由的天空后,他们的小明立刻回报给了父母一连串的喜悦。

兴趣,现在是春桃夫妇最为看重的教育方向。学校布置微电影拍摄的作业,春桃夫妇去调查淮河污染时便带上了孩子,最终,小明制作的以淮河污染为主题的记录小片获得一等奖。正是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,小明开始自学各种软件制作程序。

这个家,终于重归平静。更重要的是,沟通与理解,在两人间正在成为一种习惯。

“小明没有北京户口,以后考大学怎么办?高中是不是还要回老家去上?”记者问起这个现实的问题。

“孩子已经打算走绘画这条路了,初中毕业后打算直接报考美术学院。”一年前,春桃夫妇带着小明去日本开会,孩子没事就在旁边画画,一位当地的教授赞叹不已,劝小明留下来进修,这让陈桂棣夫妇倍受鼓励。

“当我们对中国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时候,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为孩子寻找成长的出路。”陈桂棣说。小明的出路找到了,记者为孩子高兴之余,内心不免为自己的外甥难过起来——一个和小明一样年纪的男孩,在二线小城市中,正在经历着中学里的高压,来自老师动辄得咎的处罚,伤害自尊心的严厉斥责,让原本热情似火的少年,正在变得郁郁寡欢毫无生气。

家里人看着他一天天变得阴郁寡言,却无可奈何束手无策。“孩子本性挺好的,只是有点粗心,但现在学校老师容不得这些。”外甥的父亲在接受了老师一下午的当面斥责后,情绪低沉地说,“我现在只想要儿子快乐,成绩已经不重要了。”

究竟,当下的学校里,还有多少个曾经的小明,又有多少对父母,正经历着陈桂棣、春桃曾经的痛苦?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?

这个深冬,京城无雪,街市中摇曳着曾经在这里读书的歌手王菲的声音。

38年前,在北京地坛小学念书的时候,母亲一度不许自己的孩子参加任何表演。但是,王菲依旧热衷学校里的文体活动,还被选为文艺委员,中央电视台的银河少年艺术团,成了这个小学生快乐的天堂。

多年后,王菲唱给我们这样的心情——我想找条出路,到底有没有出路?我试图接近幸福。可什么是幸福,我概念模糊。

是的,没人能辨清一个孩子的未来。无论学校还是家长,需要弄清楚的是,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